



西藏兴学： 清末文化固边的重要举措

1888年和1903年英国军事入侵中国西藏地区，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《拉萨条约》《中英会议藏印条约》及《藏印续约》，使西藏逐步沦为英国的半殖民地。为了挽救边疆危机，清廷决定整饬藏政，以联豫为代表的驻藏大臣推行藏事改革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西藏兴学。

西藏兴学是伴随着“清末新政”逐渐展开的，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清政府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实行新政，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化教育。其中“兴学”是“清末新政”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在内地“兴学风潮”的推动下，驻藏大臣联豫推行兴学以响应清朝中央政府的号召，由此开启了“清末新政”背景下西藏兴学的先河。

林松

设立西藏学务局，创办新式学堂

1906年，清廷任命联豫为驻藏大臣，总理西藏事务。他按照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桓驻藏期间发展西藏新式教育的构想，将教育新政付诸实践。抵藏上任后，他见“藏中铜敝日久”且西藏为“滇蜀之屏蔽，番汉杂处，文化未开”，决心力图改革，创办新式学堂，推行新式教育。

1907年，在联豫主持下，西藏成立了学务局，置总办汉、藏各1员，以此统领全藏教育事务。学务局的成立，为西藏兴学奠定了基础。此后，联豫在西藏设立初级小学堂两所，分学生为两班，以三年为学期，劝令番民选送子弟入学，与汉民学生一律教授，不征学费，以期逐渐开通，为将来推广学化，番民自立学堂之基础。

新式学堂创办之初，数量较少且仅局限于拉萨几所，而西藏地域辽阔，这难以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，因此联豫决定将兴学范围从拉萨逐渐推广到西藏的工布、达木、山南等地。比如在达木等地设立小学堂，据史料记载，联豫在上报给清廷的奏折中写道：“达木八族原系蒙古种类……习用番人之语言文字，亦属非是，因稟请选派教习，前往达木地方，教以中文中语，以期渐明事理。”“选派二人携带中国浅近书籍，赴达木开办小学两处，教以中文中语及浅近论说、算学等事。俟将来果有成效，然后再为推广，开通文化。”该时期，除拉萨以外西藏地区成立的学校，还有达木第一初等小学堂、达木第二初等小学堂、后藏汉文小学堂、拉里汉文蒙养学堂、靖西汉文蒙养学堂等。

西藏地处边疆，与内地语言不通、文字不同。为了解决驻藏大臣衙门因语言不通给行政事务带来的不便，并使西藏地区的汉族人能够认识藏文，藏族人同样也能够认识汉文，1907年，联豫创办了藏文传习所和汉文传习所各一所，选派汉人子弟10余名专学藏文，选派藏人子弟30名专学汉文。为了达到抵御外敌、巩固边疆的目的，联豫在西藏创办了一所陆军学堂。同时，还在西藏设立警务学堂，以期造就警学人才，服务地方公共事业。

制定办学章程，推行新式教育

清末西藏创办的各类新式学堂，纷纷制定办学章程，力图通过新式教育改革以宗教教育为主导的西藏传统教育。

其中，蒙学堂主要面向各民族幼童招生，食宿免费，课程设置“参酌初等小学及蒙养院章程，以国文为教科之主体，改良其习惯语言”，并普及基础文化知识，为更高阶段的教育奠定基础。

小学堂则在蒙学堂的基础上设立，课程设有自然科学、体操等，教材多译自内地。学生多为中下层贵族及商户子弟，旨在培养具备现代常识的基层人才。

陆军学堂“选其年少识字而聪敏者，约得二十余人，并调汉属之达木三十九族十人，藏番十人，又廓尔喀亦求送四人，一同入堂肄业，拟定为速成科，一年毕业”。课程内容包含军事操练、战术基础、地图测绘等，使就学者能了解军事技能与技战术。陆军学堂办学效果明显，为西藏训练了首批现代军事骨干，有效保障了西南边疆安全。

警务学堂入学要求略低于陆军学堂，注重体能和纪律训练。课程包括法律基础、治安管理、侦察技术等。生源来自清军士兵及藏族青年，规模较小。它的创办提高了警兵的文化素质、专业技能，对维持西藏的治安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筹集办学经费，奖励边学教习

为保障在藏所开办各类新式学堂的正常运行，驻藏大臣联豫多方筹措办学经费，所筹经费不仅有地方官绅的捐资，也有抄没充公的财资，还有不法商人主动捐资以求赦罪的款项。然而，西藏兴学仅仅依靠这些渠道筹措经费实不敷用，为了使西藏兴学渐著成效，联豫向清朝中央政府请示筹拨学务经费，奏请“按年提银一万两，自宣统二年为始，以资应用，划分学区，筹备校舍，遴选教习，购置图书，总期款不虚糜，事求实效”。

西藏地区气候恶劣、条件极其艰苦，若“廩糈过薄，即贤者恐亦难久于其事”。考虑到这些实际问题后，联豫上奏清朝中央政府奖励边学教习、学务人员。对“西藏调用人员，准其厚给薪资”。具体措施是对在藏所办各类学堂中从事教习的官员“应遵照请奖，以资策励”。对于“浙江武备学堂毕业生现充陆军士兵第一营管带谢国梁等武职人员，系照异常劳绩请奖”“均先授以官阶，实足以资鼓励”。对于派充到各学堂的教员，且均已服务期满三年者，予以奖励。由此可知，清政府给予西藏边地教习的待遇甚为优渥，除厚给薪资外，还酌予拔升官阶。因此，这些内地教习来藏后甚是尽心尽力，使得该时期西藏教育得到较快发展。

在边疆危机和“清末新政”双重背景下，为了增强西藏各族民众的智识，抵制列强的文化侵略，清末西藏兴学把兴办学堂、广泛开展汉藏语文教育等，视为抵制外国侵略的紧急措施之一。创办新式学堂、发展新式教育，筹集办学经费、奖励边学教习等措施，推动了西藏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，为西藏传统教育注入新鲜的血液，这不仅使西藏各族学生接受近代自然科学知识、开阔了视野，还加深了汉藏等各兄弟民族之间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清末西藏兴学的种种举措，收到了较好的“文化固边”之成效，对中央政府强化西南边疆治理，加强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、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亦具有深远影响。

据《学习时报》

柳亚子创办上海通志馆

1932年初，国民政府决定设立上海市通志馆，并推举柳亚子出任馆长。表面上这是委以重任，实则只想给他一个虚职，并不期望真正有所建树。

柳亚子却以极大热忱对待这项使命。他视修志为一项严肃的文化事业，坚持“史以求实，志以存真”的原则，拒绝将通志馆变为安置亲信、徒领薪金的闲散机构。为此，他提出“约法三章”，否则绝不就任。

这三项条件包括：第一，编辑方针和志馆人事安排，须完全自主，不受外界干涉；第二，志稿须突破惯例，采用语体文（白话文）撰写；第三，志稿纪年一律以公元为主，传统年号仅作注释。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，政府公文仍通用文言，官方历史书写严守旧制，柳亚子的主张无疑具有突破性，甚至被一些人视为“破坏法统”。

最终，受当局的委托，同为南社出身、思想开明且与柳亚子交友深厚的邵力子出面商谈。因彼此信任、理念相近，两人一夜深谈即达成共识。邵力子欣然接受三项条件，并承诺尽力支持。

1932年7月14日，柳亚子正式出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，开始了历时数年的修志工作。他秉持尊重历史、坚守真实的原则，克服诸多困难，和通志馆同仁共同努力，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完成了1000多万字的《上海市通志》初稿，并交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，为上海历史文化的存续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周星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郑振铎以文抗战

1937年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中，郑振铎寄藏在上海虹口开明书店内的1万余册书籍，被日军炮火“烧得片纸不存”。面对如此浩劫，他毅然留在沦陷区的上海，以抢救民族文献的方式报效国家。他道出这样的心声：“史在他邦，文归海外，奇耻大辱，百世莫涤”。

除了抢救古籍，郑振铎还通过文学创作直接鼓舞抗战士气。1937年10月，他出版了新诗集《战号》。这部诗集收录了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诗歌，共同的题材“只有一个——抗战！”郑振铎在《献词》中写道：“（这些诗作）托寄着我的悲愤，我的热情，我的希望，乃至我的信仰，我的幻想。”诗集中的作品，反复呼吁“沉睡者，起来，起来！”“我们的中国……我们将为你而工作，工作，工作，直到你恢复你的强健与富饶”。

1937年，郑振铎在炮火中耗时10天，将家藏戏曲善本整理成《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》和《西谛所藏散曲目录》两本目录。他亲笔撰写并付雕版印行，先用朱砂印出“红印本”，再用蓝靛刷印“蓝印本”。这些目录中记录的《酹江集》《柳枝集》等明版插图本戏曲，是他十余年苦心搜集的稀见善本，更是“先民精神所寄”。由于刊印量不足50册，版本学家江澄波认为：“由于流传极少，今后将与宋刊同珍。”这些书目不仅保存了文化记忆，也成为郑振铎在文化抗战中的重要贡献。

1940年1月，郑振铎与张元济、张寿镛、何炳松等爱国人士成立了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。他们联名致电国民政府，建议在上海成立专门组织，寻访购买古籍。这个组织利用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开展购书事宜，郑振铎和张凤举负责寻访，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，张寿镛和何炳松负责保管经费。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，他们共抢救善本古籍3800多种、1.8万余册，其中宋元刊本就达300余种，接近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的总数。

顾燕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